

# 論憲政意識與“一國兩制”實踐的相關性

楊允中\*

作為現代公民，基本的國家意識是必須具備的，而憲政意識則應列為國家意識的一個核心內容。本文擬就憲政意識與“一國兩制”實踐的相關性提出一些判斷，以推進澳門特區依法施政與愛國愛澳傳統逐步進入新形勢下新常態。

## 一、憲政是立國之本，是建國的基礎工程

通常一提起現代化，人們不約而同地首先關注科技和教育現代化，離開發達的現代化科技和現代教育，要實現工業、農業以及國防現代化，幾乎是匪夷所思、不可思議的。認真觀察現代發達國家，人們不難發現，構成全面現代化的還有一項基礎工程，那就是法治的現代化，尤其是憲政現代化。作為一個現代化起步較晚的國家，當代中國的憲政現代化之路當然也要真正從國情出發，真正堅持已被實踐認定科學可行的中國特色。

憲政到底是甚麼？憲政與憲法是甚麼關係？在現代社會，在民主、法制廣受認同的時代，沒有理由對位居法治核心的憲政心存芥蒂，不管有意無意，承認憲法而否定憲政即把憲政與憲法分割起來，是一種欠缺理論依據的偏激做法。在倡導全面依法治國的今天，進一步提升憲政意識、進一步加強憲政建設，是一項事關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的基礎工程。

早在 1999 年國家第三次修憲時已把“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從而成為

一項基本國策，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當然要依法治國、依憲治國。長期以來，有關民主的討論令大家受益非淺，“民主是好東西”已成為普遍共識，民主既應有一些公認標準，又應因不同國情不同發展階段而存有某些原則性差異。同理，講憲法完善不能不講憲政，講憲法實施同樣不能不講憲政。憲政(constitutional governance)是“以憲法為依據，以民主政治為核心，以法治為基礎，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sup>1</sup> 通俗地講，就是憲法權威受到普遍尊重、憲法規範得以正確實施的憲制態勢，也可以理解為“憲法導向、保障下的政治發展，或符合憲法原則與精神的政治民主化進程。”<sup>2</sup>

健康、成熟的憲政意味着政治生態優質化，公權與民權保持最大限度平衡——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得以有效維護，民生、民主的持續推進令公民的尊嚴和幸福指數處於可比的高水平。西方有資本主義憲政，中國則當仁不讓應該有建基於深厚文化積澱的東方憲政，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西方憲政有起步較早、實踐過程較長的優勢。中國憲政則有文化積澱深厚、跨越發展等優勢。兩者之間既具制度完善度、保障到位度、意識成長度、效益充分度等屬普遍規律的可比性，也具有因文化傳統、法律創制、路徑選擇等國情差異的不可比性。從可比性考慮，互相參照對比目的是找出各自優劣，從而取長補短、自我優化，而不是盲目同別人攀比，更不是妄自菲薄，甘心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

目前，中國國情依然十分特殊，無論經濟、社會發展，二元結構特徵相當明顯。在東部沿海發達地

\* 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顧問、教授

區，特別是幾個所謂一線城市，其基礎設施與綜合服務水平即使同歐美中心城市相比也不遑多讓，但中西部地區未脫貧居民的貧困度同國外落後地區亦相差無幾。就人口而言，一方面，在嚴苛人口政策下總量仍大幅增長，一年增長值便可達到某些中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另一方面，東部發達地區中心城市人均GDP已同中等發達國家基本上標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已成現實，中國富豪數量之多、財富積累之快、世界影響之巨令人震驚，但至今中西部還有7,000萬人口(按聯合國標準則有2.5億人)未脫貧，中國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可能全球罕見，共同富裕的目標仍然遙遠。故此，可以講，迄今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包括基本政治制度能夠成為中國模仿的對象，好在近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創造的中國特色成長之路不僅極大地增強了國人信心，而且舉世矚目的發展成效也在頗大程度上令世人刮目相看。

作為有重大國際影響的現代大國，中國在理論戰綫尤其要有足夠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推行法治和憲政，中國起步遲於西方發達國家，但經近幾十年奮起直追，後進的帽子已基本摘掉。我們尊重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西方憲政理論大師的建樹，尊重西方發達國家憲政建設的某些成就，但更要從自身歷史和國情出發堅持走出一條有自身特色的新型憲政發展之路。

維護憲政體制的原則主要有三條：“①國家權力是人民授予的，不得行使憲法沒有授予和禁止行使的權力；②國家權力不得侵犯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而且有義務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③樹立憲法的最高權威是憲政的集中表現。”<sup>3</sup> 這表明合理約束公權力與擴大公民基本權益保障即建立真正當代意義上的良政善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生活在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並非可以同“憲”字脫鉤。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是特區基本法的母法，基本法是憲法特別授權下的重大憲政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的劃時代創新，在居民基本權益方面甚至可以享受到憲法與基本法的雙重保障。關注憲法規範的完善、提升憲政意識的認知以及針對各界特別是青少年一代推行愛國主義教育，一時一刻也不應淡忘。

## 二、中國憲法成功自我完善

### (一) 依憲治國是現代法治文明核心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sup>4</sup> 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憲政六十多年實踐的歷史總結。“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sup>5</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莊嚴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第5條)“憲法作為根本法，其內容涉及社會生活、國家生活的全面，規定着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人們最根本的活動準則。”<sup>6</sup>

早在三十多年前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彭真便曾指出：現行憲法的制定“繼承和發展了1954年憲法的基本原則，充分注意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豐富經驗，也注意吸取國際的經驗；既考慮到當前的現實，又考慮到發展的前景。”因而，它是“一部有中國特色的、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長期穩定的新憲法。”<sup>7</sup> 改革開放37年來國家與社會生活發生的翻天覆地般變化，令人信服地證實了現行憲法包括1988、1993、1999、2004年四次修正案引導與保障作用居功至偉、勿庸置疑。

### (二) 人民主權理論的堅守

憲法完善、憲政發展是現代文明的核心標誌，也是國泰民安、政通人和的根本保障。毫無疑問，中國憲政發展起步較遲，從清末至今不過120年光景，而且在制憲、行憲道路上也經歷過不少的反覆和挫折，但縱觀改革開放新政以來現行憲法牽引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進程，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憲法完善度和憲政實施度不僅達到了歷史上不曾有過

的新水平，而且也創造了特色鮮明、獨樹一幟的中國體系、中國風格憲政。

**理據之一**是業已建成穩定運行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前者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組織形式，人民選舉代表，組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作為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後者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這四大政治制度既深植於中國傳統文化土壤，又帶有顯明的時代背景和東方法治文明特徵，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制度創新。

**理據之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業已形成，2011年兩會期間，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已代表國家作出正式宣佈，並正式在十八大報告中得到確任。截至2014年12月，中國已制定現行憲法和有效法律242件、行政法規737件、地方性法規逾8,500件、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逾800件。這就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以及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社會生態，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制度化、法制化奠定了紮實基礎。

**理據之三**是憲法權威逐步受到應有尊重。正如習近平所講：“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憲法的根基在於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憲法的偉力在於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sup>8</sup> 憲法高權威性在內地受到越來越充分的尊重並逐步進入常態化，現實生活中“黨大還是法大”的爭議已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理念所取代。近年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的認知，則可令“一國兩制”的正確實踐提升到全新水平。

**理據之四**是人民群眾合理維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由於存在過千年封建帝制，中國的封建意識凍土層十分深厚，無論仍在全力打擊中的貪腐行為還是家長制、一言堂、歧視婦女等社會現象，其根與源都在於這種封建意識的劣根性、頑固性、失範性，都在於現代法治實踐中公民意識的缺位和科學理性的核心價值觀的扭曲。

故此，“我們要依法保障全體公民享有廣泛的權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證公民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努力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我們要依法公正對待人民群眾的訴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決不能讓不公正的審判傷害人民群眾感情、損害人民群眾權益。”<sup>9</sup>

這是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所要求，也是尊重基本人權、發揮制度優越性、發揮億萬民眾正能量的動力來源。憲法2004年修正案經反覆論證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補進第33條；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擴大地方立法權並對可能越權的行政行為進一步作出約束：“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依據，部門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範，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或者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十二屆全國人大開始，城鄉居民的選舉權實現等值化，進一步體現國家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堅定性、徹底性。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默默奉獻的2.7億農民工及其子女的平等權有望在不久將來得到公平解決。全國範圍內平反冤假錯案有了重大突破，內蒙被誤判姦殺罪並被執行死刑已18年的呼格吉勒圖案2014年得到昭雪並依法獲得國家賠償。這些切實舉措深得人心，但民間維權依然舉步維艱。可喜的是，以前過激非理性抗爭為主的維權似乎已進入依法甚至依憲維權的較高文明階段，儘管憲法規範保障的基本權益還存在頗大提升空間。

### （三）領導核心力量刮骨療傷常態化

中國是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總人口已達13.7億，佔全球1/5有多，中共黨員達8,600萬，分別超越英、德、法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也可能超越全球各國政黨成員之總和。樹大有枯枝，在如此巨大群體中存有某些不健康現象，究其原因確實複雜而多元，但畢竟是非主流個別行為，而且全面從嚴治黨業已被推動到執政黨高端議事日程。

中國憲政發展有起步遲、國情複雜、偶有反覆等不利因素制約，也有文化積澱深厚、崇尚文明禮儀、

跨越發展等時代動因牽引。改革開放更令中國憲政迅速駛入快車路，不僅彌補了過去許多空白點，縮小了同某些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沿着有自身特色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和平超越的獨特路徑前行，在當代任何低估中華文明、中國創新、中國正能量的判斷都不符合實際，都要被社會實踐所否定。

中共十八大以來，反腐倡廉、老虎蒼蠅一起打，成為深化改革的一張王牌。僅 2014 年，檢察機關共查辦各類職務犯罪案件逾 4.1 萬件 5.5 萬人，人數同比上升 7.4%。其中既有周永康、徐才厚、蔣潔敏、李東生等 28 名省部級以上的“大老虎”，也有涉及社保、拆遷、扶貧救災等民生領域 9,913 名“巨貪小官”。<sup>10</sup> 2014 年啟動的境外“獵狐”工程得到多個國家合作配合，令潛逃國外的貪腐犯罪分子難尋藏身之所。當前，全面深入推進的反腐肅貪工程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力度之大、震撼之強世所罕見。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中國式權力約束，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的與時俱進和自我完善。

總而言之，經過四次修正的現行憲法，其完善度和權威性不容低估，其創新價值和時代意義更十分突出。正如習近平所講：“30 年來的發展歷程充分證明，我國憲法是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好憲法，是充分體現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充分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好憲法、是推動國家發展進步、保證人民創造幸福生活、保障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好憲法，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經受住各種困難和風險考驗、始終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根本法制保證。”<sup>11</sup>

### 三、創新型基本政治制度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的有效載體

發展是各國人民永恆的主題，不僅要重點關注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政治、文化領域的發展也應常態化；追求高質量的物質生活，同關注多彩文化、確保以政治平等、人格尊嚴為核心的民主實踐，是互為關聯、互相促進的基礎發展目標。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

適用於一切國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因此，“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有機統一。”<sup>12</sup> 由於政治制度是用來確定國家發展方向、發展路徑和發展方式，用來調整政治關係、建立政治秩序、確保長治久安、政通人和即繁榮穩定的大原則大方向的，故對政治制度的認定與堅守必須遵循人類文明演進的規律性、普通性、與時俱進性，必須堅持從具體國情出發、從社會現實出發，自己的命運由自己把握，自己的發展前景用自己的雙手和頭腦去開創。

中共十八大在界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時，用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表述，在現有三項基本政治制度後面用了一個“等”字，這表明對現有基本政治的認定並未終極化，實踐中已經出現或即將出現的新型政治制度完全可能被國家在適當時機確認為國家級基本政治制度。

現有四大政治制度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早在六十多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便以《共同綱領》這部代憲法作出指引，並由 1954 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和首部憲法的制定為標誌正式啟動運行。如今一年一度的“兩會”即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全國人大年度例會和體現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全國政協年度例會已成為最具中國特色的政權運行方式。進入 21 世紀以來，“兩會”越來越成為觀察中國政局和發展走勢的風向標，說中國基本政治制度已進入內涵型、質量型發展新階段也許並不過分。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組織形式，是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現行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 1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第 2 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第 3 條）。

這種由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產生的新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體現了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愛國者的根本利益，體現了中國各民族、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根本利益。保證全體人民行使國家權力，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實質，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體現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本質。它既有利於全國人民參加國家管理，也有利於在民主的基礎上有效地處理國家事務。”<sup>13</sup>

中國現有中央、省、市、縣、鄉(鎮)五級人民代表，總數約 260 萬人，他們中間絕大多數都是各行各業精英，都是作出重大貢獻的先進人物，代表廣泛性十分突出。以全國人大為例，在總數不超過 3,000 名情況下，56 個民族中最小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在不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特別行政區也安排了遠超人口比例的代表名額。在每屆人代履職期間因違反法律、行為不檢被撤銷代表資格者也時有發生。

在總結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時，習近平指出：“在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在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是深刻總結近代以後中國政治生活慘痛教訓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中國社會一百多年激越變革、激蕩發展的歷史結果，是中國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運的必然選擇。”<sup>14</sup>

另外三項基本政治制度也各具特色。其中，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也是中國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中國不實行西方的兩黨制或多黨制，但實行執政黨內部監督與同民主黨派互相監督相結合、集中執政黨智慧與參政黨智慧相結合。六十多年實踐已充分證明這項制度的優越性和有效性。

#### 四、“一國兩制”

##### ——中國憲政發展史上的一次大創新

###### (一) 讀懂中國這部大書不容易

世紀之交中國的和平崛起應列入最具震撼性的一條信息。正確認識中國，正確詮釋“當代中國”的深刻內涵，不僅外國人不容易，就是中國人自己也要認真下下功夫。

作為最大的文明古國，中國不僅歷史悠久且不曾中斷，而且文化積累淵遠流長。早在二千多年之前，儒釋道等哲學體系即已分別創立，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福禍相依等辯證理念深入人心，古代四大發明是中國物質文明昌盛的主要基因，也有力拉動了各國生產力發展。直至 18 世紀末，中國基本上是東方以至全球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和牽引者。19 世紀 40 年代鴉片戰爭之後的百多年間，實行封建帝制的中國積貧積弱、屢戰屢敗，成為大小列強欺壓盤剝的對象。中國受欺時間之久、不平等條約簽署的數目之多、向中國施暴的主體之眾、形式之殘酷複雜，無以復加，《馬關條約》、《辛丑條約》創下的天文數字賠款成為戰爭史上無法改寫的世界紀錄。然而，災難、厄運同時也考驗、鍛煉了中國啟蒙者和人民大眾的智慧，驅使他們加速覺醒、團結、奮進，在逆境中走向成功，在挫折中走向成熟。

###### (二) 考驗政治智慧的複雜國情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着中華民族跨進了自身發展的歷史新時代。建國前夕由首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 1954 年 9 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新中國兩部有重大歷史價值和深遠影響的大憲章。當時國情是在中國大陸實現了中國歷史上除元朝之外境內最大範圍的統一，與此同時，歷史遺留的台港澳問題主要緣於外部原因不得不押後解決。儘管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毛澤東、周恩來即已明確提出台灣問題可以用非武力解決並為此作出過實質性探索，包括有“一國兩制”基因的“一綱四目”方針的推出。遺憾的是，曠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令預期中的和解努力無疾而終。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在鄧小平等承前啟後推動下，“一國兩制”方針作為國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願迅速被確定為基本國策，並在 1982 年憲法中破天荒地以憲法特別授權形式作出了積極指引，這便是著名的第 31 條：“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是 1982 年制定的現行憲

法的預見性規定。連同憲法第62條第13項把“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列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當履行的職權之一，以及2004年修正案把第59條修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和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即補上特別行政區。這樣，現行憲法直接涉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規範就有三條，共同構成了對“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完整而科學的設計。

在憲法指引保障下，中央以“十二條”羅列出作為未來特別行政區制度核心的十二項基本方針政策，這些原則在隨之開展的中英、中葡談判中成為中方底綫不可越逾，兩大外交談判結束並發表聯合聲明，這十二條被全文寫進聯合聲明正文，連同中方提供的附件一更加詳盡的政策闡述，使這項基本國策開始具備法制化、規範化的完整框架。為了不失時機地落實基本國策，國家在兩部聯合聲明簽署後馬不停蹄隨即開啟了香港、澳門兩部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諮詢工程。在有香港、澳門各界有代表性人士參與下，分別歷經4年半有多，經幾上幾下反覆諮詢，1990年4月4日和1993年3月31日兩部基本法正式出爐面世。這兩項系統工程之浩大，中外法制史上前所未有。

港澳兩部基本法有效地令“一國兩制”方針實現了具體化、規範化、法制化，其起草過程直接創造了多項國家甚至世界的憲政領域之最：①起草委員會的高層次性、代表性、專業性歷來罕見，由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常設機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組建的兩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份屬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機構，其成員除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成員外還包括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和為數可觀的國家一流法律專家及其他領域專家，更吸納港澳兩地有代表性人士。這樣編組在中國歷史上尚屬首次。為配合起草順利進行，國家還推動成立港澳兩地規模龐大、代表性極強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②起草時間分別長達4年8個月和4年5個月，是國際上任何國家任何法律起草不曾有過的漫長過程，超過現行1982年憲法起草2年4個月一倍以上。③為了展示兩部基本法的前置規範指引作用，正式通過並頒佈同法律正式生效實施的提前量超大，香港為7年2個月24日，澳門

為6年8個月19日。④兩部基本法制定權、修改權均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同憲法本身的安排一致。

⑤基本法規定港澳兩特別行政區擁有兩種正式語文，擁有特定標識區旗區徽，這在中國開創了一個憲制先例。⑥港澳兩特別行政區享有國家授予的一定對外活動權，可在適當領域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並發展關係。⑦分別設立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在中國為一部法律的實施專門成立直屬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常設機關的工作委員會，這是歷史上首次。⑧不能不提及的另一重要事實是：中央人民政府即國務院成立專注落實“一國兩制”方針、落實基本法而直接管理香港、澳門兩特區的港澳事務辦公室並在全國各地成立對口的港澳辦。這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理念的一項針對性極強的特殊安排。

## 五、“一國兩制”的多重創新價值

### (一) 形象化的中國特色

在當代中國，講中國特色離不開“一國兩制”，講“一國兩制”，其價值、意義令中國特色更加形象化、具體化、現實化。“實踐充分證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國兩制’方針，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重要組成部分的祖國和平統一道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sup>15</sup> 正確認識“一國兩制”，提升對貫徹“一國兩制”的自覺性主動性，已成為一項擺在全國人民面前一件大事。“一國兩制”表面上似乎僅僅實踐於香港、澳門兩個特區，似乎僅僅事關兩個特區的繁榮穩定，實際上它是當代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性事業，是關係國家和平統一一目標和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方向、大目標、大政治、大智慧。

鄧小平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當然也是“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總設計師。鄧小平親自設計的“一國兩制”理論，把兩大制度間傳統勢不兩立對立關係推向一個對對方不傷反益的新階段。他反覆強調：“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

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着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綫索。”<sup>16</sup>

鄧小平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開拓了經典理論新境界。“鄧小平理論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基本成果，抓住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對社會主義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sup>17</sup>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別是“一國兩制”理論，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社會制度的對抗、衝突、鬥爭推向可以用求同存異、互利共贏、對立統一的嶄新思維加以解決的新模式新格局，不僅使歷史遺留的某些複雜問題迎刃而解，而且把傳統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推向一個歷史發展新階段。

## （二）“一國兩制”的價值認定

在統一的單一制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歷史背景特殊的局部小範圍內保留其原有的非社會主義制度，這不僅是中國的史無前例，而且在國際上也絕對前所未有，因而成為不折不扣的大膽而務實的憲政領域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富想像力的認知大突破和最富震撼力的政權大變革。

由基本法所體現的“一國兩制”憲政，其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因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

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sup>18</sup>

在基本法序言、總則、中央與特區關係部分清楚地顯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與基礎，港澳兩地回歸後新建的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主權下不可分割的部分，當然更是直屬中央政府管轄並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在特別行政區存在兩個公權力：上端是國家公權力，包括國防、外交、行政長官與主要官員委任、立法備案、中央與特區關係、基本法解釋與修改等涉國家核心利益、須依憲調整的事宜統由中央政府操控；下端是特區公權力，涉特區高度自治範圍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則由行政長官及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公權力機關分別依法行政。在特區高度自治權範圍內同樣存在公權力的依法行使與自我約束和居民基本權益有效保護兩個層面，由於“一國兩制”基本國策中“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佔有一個十分突出而核心位置，故廣義理解所有港人和澳人都構成這項基本國策的行為主體，反言之，生活在特別行政區的港人和澳人亦不言而喻地要成為“一國兩制”憲政要求的真正愛國者。

根據對體現“一國兩制”原則與精神的兩部基本法的理解，根據對港澳兩特別行政區分別近四個五年和長逾三個五年實踐期的系統觀察，把基本判斷歸結為八項核心認知是適宜的：①“一國兩制”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在認知、理論、制度和實踐領域的劃時代創新；②“一國兩制”理論應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主要內涵之一；③“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有條件、有必要列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④愛國愛澳如同愛國愛港一樣事實上已成為當代特別行政區居民第一核心價值；⑤“一國兩制”屬於特區政府和居民，以至全中國人民的共同性事業；⑥要堅持“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在實踐中提高實踐水平；⑦“一國兩制”作為中華文化、東方文明的一大制高點，作為體現多重創新成果的認知總匯，最有條件作為新興複合型獨立學科和顯學得到全面推廣；⑧“一國兩制”體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社會制度的嫁接優勢，特別行政區某種意義上講

是社會主義利用、改造和駕馭資本主義的示範場。<sup>19</sup>

### (三) 導致嶄新學科形成的理論與制度創新

在一個實行單一制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局部特殊地區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 50 年不變，這在近百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生共存時代，不僅政治家、思想家甚至學術界亦是未曾觸及過的嚴肅課題，如今業已得到富有成效、富有啟迪的妥善解決。香港、澳門兩特別行政區富有啟示的實踐，有效地驗證了這項制度創新的成功，同時也令人信服地把自身理論成熟度推向了有目共睹的高峰。這是一個大理論、大學科，把它定位成“一國兩制”學包括“一國兩制”法學、“一國兩制”政治學、“一國兩制”社會學、“一國兩制”經濟學、“一國兩制”哲學等等完全可行，給它取個較為通俗的“共贏學”或互贏學、多贏學(polywinology, win-winology)名稱恐亦未嘗不可。<sup>20</sup>

實踐證明 20 世紀後半期開始的新時代是人類認知體系大突破大創新高峰期；實踐也證明，擁有五千年不間斷文明史的世界最大民族擁有足夠潛質和智慧在改變歷史、改變命運進程中有所作為、有所表現。時至今日，說“一國兩制”是文明史上最大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絕不為過，把它認定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一門顯學，當之無愧。其基本理據是：①它有嚴謹、系統的研究對象和範圍，包括國家主權論、兩制共存論、澳(港)人治澳(港)論、高度自治論、政策穩定論、長期示範論、思維創新論、和平發展論等；②它直接涉及政治學、法學、國際關係學、國防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心理學、美學等諸多基礎學科；③它有憲法規範的授權與保障，並通過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加以法制化、系統化，形成目標明確且具可行性、可控性、可操作性的特別行政區制度；④它已導致經典認識論、方法論領域發生史上罕見的深刻變化；⑤它早已轉換成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活生生現實，其實踐進程充分驗證了這一新興發展模式的科學性、生命力、優越性、啟示性。<sup>21</sup>

### (四) 成熟度有目共睹

在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實踐永無止境，提升對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發展規律的認識也永無止境。

“一國兩制”不僅在港澳特區為期不短的實踐中站穩了腳跟，驗證了自身的科學性與生命力，而且在諸多方面包括認識論領域展示了不容低估的優越性和獨創性。

可以肯定地講，作為一項嶄新制度，它還有待於在未來長期實踐中進一步完善。其未來發展走向是一元還是多元，終極目標如何進一步做出科學論證，這不僅對特區以至全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都是一大考驗，而且對特區領導人和國家領導人恐怕也是一大考驗。迄今在國家範圍內似乎依然存在不聞不問或少聞少問一類傾向，“一國兩制”值不值得高度關注、重點關注，它同當代中國和當代中國人構不構成正相關，到底甚麼是“一國兩制”，它同正宗科學社會主義、同正宗馬克思主義有沒有直接關聯？答案其實十分之清楚。

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其核心理論體系兩大支柱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主張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承認社會發展的相對性，認定資本主義勢被社會主義所取代，而辯證唯物主義堅持三大主體價值認定即質與量互換律、否定之否定律、對立統一律。“一國兩制”與三大規律都存在直接間接的認知關係，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理念是“一國兩制”方針賴以成立的認識基礎，對立統一、矛盾轉化理念，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的對立統一在特別行政區，這恐怕可以推定為認識論領域最大的對立統一。故此，正確的認知、合理的邏輯應該是：在特殊國情、特殊時代背景下推行“一國兩制”非但沒有背離正宗馬克思主義，反而應認定為馬克思主義在當今時代的變通應用或稱之為時代創新。

當前，在兩大社會制度依然共存時代，在主體日益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個別局部地區允許保留原有資本主義，標誌着辯證唯物認識論領域的重大突破，標誌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成熟，這是其一。在保留原有資本主義並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澳門，並非樣樣都是資本主義屬性，特別行政區是社會主義中國中央政府領導下具一定特殊性的地方行政單位，“一國兩制”是其基本屬性，故整體觀察，它不“性資”而份屬“性社”，這是其二。在新興特別

行政區有必要也有條件通過資源配置、結構重組實現“兩制”的嫁接、整合、集成，建立高效的新型生產函數，推動勞動生產力穩定增長，使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區成為“三個有利”的全新展示窗口，成為制度創新的有效載體，成為社會主義利用駕馭資本主義的創新實踐平台，這是其三。<sup>22</sup>

故此，“實行‘一國兩制’不是出於權宜之計而是長期基本國策；不是無原則消極讓步而是富有創意的積極進取；不是簡單的新舊更迭而是構思精密的基因再造；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新人新事而是前無古人、世所未聞的大建構、大開拓、大開放、大創新。”<sup>23</sup> 這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制度的成功改革與自我完善，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經典理論在新形勢下的發揚光大。理解它、認同它、捍衛它、研究它，不僅直接對特別行政區而且對全國人民以至國際社會都具有極高的現實意義，認定“一國兩制”是現代憲政與法治文明的制高點絕不誇大。人們有理由相信，假以時日，“一國兩制”理論影響力與現實震撼力必將在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並最終實現國家全面統一的進程中以及在化解原有或現存國際爭端中得到充分展示和驗證，從而令國人和世人眼前為之一亮。

## 六、特別行政區制度有理由被認定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中國憲政發展的一項獨特制度創新且至今已有兩個特區長逾 15、18 年實踐驗證，如果能在不久將來被認定為原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共領導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之後另一個基本政治制度，應該說已具備越來越充分的理據。“已經被定型為基本國策的這項‘一國兩制’基本政治制度，絕不是消極應對而是積極創新；絕不是無可奈何、無原則讓步，而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主動安排；絕不是損害國家核心利益，而是有效維護國家核心利益。這是具有理論、價值、制度等多重創新意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的大發展、大進步。”<sup>24</sup>

從澳門第一個 15 年“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人

們不難得出的基本判斷是：隨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澳門已進入其歷史發展的嶄新時代；隨着基本法的正式生效實施，澳門正在實行的是具“一國兩制”特徵並體現當代文明的新型特別行政區制度。這是一種新型的有中國特色的憲政制度，即由憲法及其特別法和配套法——基本法所規範並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這個新型制度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擴大了包容性，令“中國特色”增加了積極有益的新鮮內容，令祖國大家庭增添了認祖歸宗的特殊成員。特別行政區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健康成長進程，更進一步證明了“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制度的雙重創新價值，證明了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也可以融合互補，資本主義合理部分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為其服務。這種社會制度“具管治形式的垂直從屬性、權力來源的授予性和權力行使的自主性、思維與制度的雙重創新性、既定目標與實際利益的高度一致性、示範效應全方位性等特點。”<sup>25</sup>

人們經過認真觀察與深入思考，不難得出的一項基本認知是，體現“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原則與精神的特別行政區制度，現已有條件列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早在 2010 年 12 月由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共同主辦的“一國兩制”專題研討會上，本人作為主要起草人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吳邦國委員長所報送的建議書中便陳述以下相關理由：①建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②經過港澳兩部基本法的制定，“一國兩制”與特別行政區制度已具有完整的法制框架與保障體系；③經過香港特別行政區 13 年實踐與澳門特別行政區 11 年實踐驗證，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科學性與生命力、優越性與競爭力得到全面展示；④“一國兩制”事業既是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特區政府和居民的莊嚴事業，也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事業；⑤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直接同祖國和平統一和民族偉大復興息息相關，是有待多代人為之奮鬥的長遠目標；⑥特別行政區制度或“一國兩制”政治制度同特別行政區保留的原有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同概念，絕不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也不應被視為消極的負面現象。<sup>26</sup>

把特別行政區制度列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好處很多，擇其要者有：一是標誌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憲政創新進入成熟階段；二是有助於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三是有助於港澳居民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意識的增強和自主建港、自主建澳意識的提升；四是有助於台灣同胞增進對“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五是有助於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良性互動和全國人民與特別行政區居民間相互關係的持久改善。

有人講，“一國兩制”實踐期可能僅有50年，故不宜把對其法律定位定得過早過死。其實，“一國兩制”作為基本國策提出到21世紀中已不只50年，即使21世紀中亦即第二個一百年中國夢實現時不再推行這項國策，作為在當代中國曾經實行過的重要政治制度也必然要載入中國憲政發展史以至國際憲政史。也有人講，香港有“港獨”傾向人士從來未曾中斷過試圖扭曲“一國兩制”、扭曲基本法原則性規定，並進而挑戰中央政府全面管治權的行徑，提升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定位只能進一步助長上述離經叛道行為。這種判斷有一定道理，但權衡利弊得失，加大正面規範指引力度的積極意義會遠遠超過負面防範的效應。

## 七、提升規律性認知十分重要

### (一) 認知到位事關“一國兩制”高水平實踐

澳門第一個15年“一國兩制”實踐得到國家領導人高度肯定，從憲政層面觀察，成功實踐集中體現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和《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社會廣泛深入人心、得到切實貫徹落實，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得到尊重和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有效行使，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受到充分保障。<sup>27</sup>

推動“一國兩制”在新形勢下更高水平的實踐，是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要積極面對並認真承諾的新課題。“實踐證明，只要堅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堅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堅持包容共濟、促進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廣泛團結，‘一國兩制’實踐就能沿着正確方向走穩、走實、走遠，澳門就能擁有更加

美好的明天。”<sup>28</sup>

為了令新形勢新實踐走穩、走實、走遠，關鍵性的一環便是堅持全面準確理解與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與基本法。這是一項特別行政區制度開始啟動伴生的時代要求，也是推動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創新思維完善過程。“澳門回歸祖國15取得的成就，值得澳門同胞和全國民族人民自豪和驕傲；探索積累的寶貴經驗，值得澳門同胞和全國各族人民珍惜和銘記。”<sup>29</sup>

既然“一國兩制”是體現現代憲政多重創新的積極成果，而實踐“一國兩制”則是包括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在內的探索深化過程，所以，特別行政區的官員和社會各界都應在新事新辦、特事特辦的新思維下不斷作好認知和行動調整與優化，成為真正名符其實的“一國兩制”事業正向認知主體與行為主體。

### (二) 提升認知的幾個着力點

當前，為了進一步推動“一國兩制”的正確實踐，以下幾個環節似有適當強調的必要。

#### 1. 全面加強憲政教育

實踐證明，憲政並非一個十分遙遠的神秘用詞，它本來就存在於當今時代的法治社會，存在於每個現代公民的身邊。我們古老國家，古老民族隨着綜合國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正經歷着發生深刻變革的時代洗禮，正享受到歷史上少有的民族尊嚴和國籍尊嚴。在回歸祖國大家庭後的“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居民更享有憲法和基本法的雙重保障。因而，不能不珍惜國家憲政創新設計下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優勢，不能不感恩國家感恩時代。同時，還要善於認真關注並認定香港非法“佔中”、要求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決定、鼓吹民族自決等旨在挑戰中央憲政權威行為的無理性、荒謬性、危害性。有人往往對“違憲審查”一詞頗感興趣，其實，防範各級公權力機關的行為違憲固然重要，對於社會上發生的極端民粹主義違憲一面同樣不可放任。

#### 2. 培育愛國愛澳新一代是政府施政長效工程

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一個心中無祖國的民族是可悲的，同樣，肯於自尊自重、自強不息、與時俱進的民族永遠是不可戰勝的。”<sup>30</sup> 故抓好愛國愛澳、愛

鄉愛家的心理素質培育，對於當今特區第一代建設者包括公職人員和各界人士依然具有現實意義，而對於特區成立後陸續出生的新一代，其意義與價值就更為突出和迫切。一個簡單道理是：香港、澳門都可認定是符合國際標準的發達社會，加之“一國兩制”方針保障的優惠史無前例。故年輕朋友自然容易誤解為這是順理成章的常態化，似乎父輩、祖父輩等長輩所經歷的不同朝代、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管治模式下歷史階段不存大的差異。與此同時，受不同價值觀、不同思潮的牽引，年輕一代行為失範失據也可能常態化。故此，在新形勢下基本法宣傳推介過程中，必要的愛國主義教育、歷史教育、國情教育，對當代年輕一代的成長絕對是無可取代的，本屆政府、下屆政府都應持之以恆抓住不放。當然，特區政府本身在頂層設計與政策制定過程中保持高端認知的科學性、準確性，以及全體社會成員“一國兩制”意識的持續提升，也是一個不容放鬆的關鍵環節。

### 3. 自覺總結實踐規律，堅持新事新辦創新思維

“一國兩制”這一憲政深度創新出現在改革開放後的當代中國，具體實踐在現有的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在推進這項史無前例偉大事業中，堅持新事新辦創新思維、自覺總結自身實踐規律是一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發展要求。如追溯特區發展史，不能不把基本法頒佈後在其指引下後過渡期事務包括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式語文化這三大歷史任務的推進給予足夠評估，由於順利實現了政權順利交接、平穩過渡，兩個特區可以說一起步就有個相當可靠的基礎。如今兩個特區已進入第四個“一國兩制”五年實踐期。過去三個五年的豐富實踐有正面經驗，也有負面教訓，兩者都成為特區以至國家財富。面對更加複雜的內外形勢，要確保更高水平的“一國兩制”實踐，一是要善用業已積累的經驗教訓，二是要敢於踐行新事新辦創新思維，“一國兩制”在一定意義上也標誌着新型憲政發展模式的科學可行與基本成功。新發展模式既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又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既令原有社會經濟制度與生活方式保持不變，又為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新政治體制、新運行機制、新施政理念得以全面啟動作出引導，其中，新興特別行政區制度已全面投入運行且已展示出

無比生命力、競爭力。

### 4. “一國兩制”系統研究進一步提到日程

前文提及“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創新至少可以在八大領域作出認定。“一國兩制”作為理論其涵蓋面很寬，其創新價值不容低估；作為學科其研究範圍和研究對象的跨越度很大、研究隊伍與研究人才的密集度很高；作為制度這項用“特別行政區制度”歸納的新型基本政治制度業已定型且發揮出獨具特徵的規範、引導作用。故此，進一步加大對“一國兩制”研究的廣度、深度和力度，應屬極具挑戰性、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時代主題，作為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客觀實體，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高層與社會各界都應進一步作出承諾，當然，整個中國學術界也應盡快作出對“一國兩制”定位的調整，因為越來越清晰一點是，“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國情、中國特色、中國智慧、中國創新；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現代化、成熟化；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與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規律；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學者思維體系自我完善的必要途徑。”<sup>31</sup>

## 八、結束語

經過長逾 1/3 世紀開拓探索、總結完善以及長逾三個五年實踐期檢驗，“一國兩制”作為全新社會制度、全新發展模式、全新社會生態、全新力量博弈已經逐漸走向成熟。從特別行政區活生生的社會現實，從國家領導人和全國人民的期盼祝福中，從海外以及國際社會日益調整視角的關注中，人們深深感到“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項核心內涵的‘一國兩制’不僅是十分完整、十分系統、十分合乎邏輯的新型理論，而且是大包容量、大涵蓋面、高創新價值的理論；不僅為新興特別行政區的開局、運行提供全面而系統的指引，而且為國家的深入改革開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定型定性和日趨完善提供了寶貴的理論支撐；不僅對中國和平統一大業的最後實現和民族偉大

復興的順利完成帶來一股全新的動力來源，而且也為新世紀新時代國際事務的處理和求同存異、互利共贏新型國際關係的建立帶來深刻啟示。”<sup>32</sup>

總而言之，完善的憲政理論，嚴謹的憲法規範、有效的憲法實施、全面的憲法認知，這是衡量現代法治國家政治生態的一項基本標準。國家治理體系創新、核心價值觀創新、發展路徑與模式創新、發展觀與認識論創新，這項人文領域的制度建設與理念調整同物質生產領域的改革創新具有同樣重要意義，也是

推進現代文明的必要着力點。

實行“一國兩制”、推進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傳統單一制憲政理論的突破，也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中國悠久文化傳統的復興。站在特別行政區新時空，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發展要加深理解，一方面，對國家核心利益的維護和基本人權保障不能淡忘，另一方面，對直接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的“一國兩制”實踐及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啟動和定位，更要倍加關注、全力推進其沿着正確軌道前行。

## 註釋：

- <sup>1</sup>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6年，第547頁。
- <sup>2</sup>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2年，第71頁。
- <sup>3</sup> 同註1。
- <sup>4</sup> 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大成立6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載於《中國人大》，2014年第18期(總366期)，第10頁。
- <sup>5</sup>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38頁。
- <sup>6</sup> 許崇德：《學而言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34頁。
- <sup>7</sup> 彭真：《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1982年12月26日在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轉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憲政法律文獻匯編》(增訂版)，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第249頁。
- <sup>8</sup> 同註5，第137、140頁。
- <sup>9</sup> 同上註，第141頁。
- <sup>10</sup> 《今年續查重要部門貪官》，載於《大公報》，2015年3月13日，第A7版。
- <sup>11</sup> 同註5，第137頁。
- <sup>12</sup> 同上註，第10頁。
- <sup>13</sup>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精粹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第1181頁。
- <sup>14</sup> 同註4，第10頁。
- <sup>15</sup> 吳邦國：《在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十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轉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憲政法律文獻匯編》(增訂版)，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第232-239頁。
- <sup>16</sup>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218、59、60頁。
- <sup>17</sup> 同註13，第250頁。
- <sup>18</sup>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頁。
- <sup>19</sup> 楊允中：《“一國兩制”理論縱橫》，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4年，第10、11頁。
- <sup>20</sup> 同上註，第62頁。
- <sup>21</sup> 同上註，第40頁。
- <sup>22</sup> 同上註，第45、46頁。
- <sup>23</sup> 同上註，第46頁。

<sup>24</sup> 楊允中：《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幾個問題》，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第7期，2011年，第15-23頁。

<sup>25</sup> 同註2，第51頁。

<sup>26</sup> 楊允中、黃來紀、李志強主編：《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76頁。

<sup>27</sup> 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載於《澳門日報》，2014年12月21日，第A1版。

<sup>28</sup> 同上註。

<sup>29</sup> 同上註。

<sup>30</sup> 同註19，第306、307頁。

<sup>31</sup> 同註24。

<sup>32</sup> 同註19，第71、72頁。